

# 捌、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新文化： 內涵、問題與前瞻

## 一、前言

20 世紀的最後 10 年期間，是臺灣進入歷史變革期的關鍵年代。隨著 1987 年 7 月戒嚴令的廢除，權力關係的重新編組與「民主化」的加速發展，成為近年來最引起注目的現象。但是，在政治變遷的表象之下，未來的臺灣文化將如何發展？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未來臺灣文化可能的發展方向，並從歷史角度說明臺灣新文化之所以形成的因素，分析未來臺灣新文化中所可能遭遇的問題及其對應之道。全文的論述分成 5 個部份：第 1 節說明全文的主題，第 2 節指出 21 世紀的臺灣新文化是以「自我意識」的覺醒並相互競爭為其特色。這種新文化的內涵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1) 從臺灣內部來看，臺灣社會中的各個「領域」（如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學術領域等）或「社群」（如勞工、農民、知識份子等）的「自我意識」都處於高度覺醒的狀態，並且不同的「領域」或「社群」之間形成激烈的競爭或推擠之狀態。

(2) 從臺灣與臺灣以外世界的關係來看，臺灣作為一個主

體的「自我意識」也逐漸覺醒，臺灣文化與中國大陸及世界的文化之區別日益明顯。

本文第3節接著探討造成21世紀臺灣新文化的3項歷史背景：(1)自1895年以降臺灣與中國大陸歷史的斷裂；(2)自1949年以後臺灣快速的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社會文化轉型；(3)自1987年戒嚴令廢除後臺灣的民主化發展。本文第4節探討臺灣新文化中「自我意識」的高度覺醒，可能引發的問題有二：(1)對內可能引起各「領域」或「群體」之間的緊張或衝突；(2)對外可能形成狹隘的「部落主義」心態。我們在第5節接著針對以上兩種可能的弊病，提出兩項建設臺灣新文化迫切需要的工作：(1)建立法治秩序以紓解「領域」間或「社群」間的緊張性；並吸納古典儒家的文化遺產以調節過度的「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2)培養開放的心靈(open-mindedness)以吸收中國以及世界文化，以開拓心胸，破除「部落主義」的狹隘格局。

## 二、臺灣新文化的特質：「自我意識」的覺醒

### (一) 特質

「文化」是人類生活的整體表現，包涵的內容極為廣泛，從學術思想、文藝創作等上層結構，到典章制度、物質建設等下層結構，均可以說是「文化」的具體內容，這些不同層次的具體內容，都植根在並反映出某種特殊於該文化的「心理結構」。由於「文化」一詞內容的廣泛，所以對「文化」的定義也言人人殊。遠在1952年，人類學家克魯伯(A. L. Kroeber,

1876-1960)、克羅孔 (Clyde Kluckhohn, 1905-1960) 就整理關於「文化」(Culture) 一詞的定義共 164 種。<sup>1</sup>在這篇論文裡，我無意討論臺灣新文化的各個層面的具體而特殊的內容，我只想通識其大體，就臺灣新文化的基本特質加以討論。因此，這篇論文中所使用的「文化」一詞，並不是指文化的外延表現，而是指文化的心理結構，也就是指文化的具體內容中所同具的精神狀態而言。

從這個定義出發，我們可以說在 21 世紀前夕的臺灣新文化的主調在於「自我意識的覺醒」。所謂「自我意識的覺醒」，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從臺灣社會內部來看，各個「領域」或「社群」的「自我意識」都高度覺醒，各個「領域」或「社群」都從過去「只存有而不活動」走向「既存有而又活動」的狀態，以不同方式建立它們的自給自足性，並反對其他「領域」或「群體」的干涉與支配。這種「自我意識」高度覺醒以後的「領域」或「社群」要求它們自身就是目的，而不再是達到它們自身以外的目的之手段。正因為如此，所以各「領域」或「社群」之間互相推擠爭勝的狀態就日趨激烈。

其次，從臺灣與臺灣以外的世界的關係來看，臺灣的「自我意識」也高度覺醒，在臺灣居民心目中，臺灣與中國大陸及世界的差異性日趨顯著，臺灣的獨特性與自主性也日益浮顯。所謂「臺灣的獨特性與自主性」，是指臺灣居民日益自覺不再是

---

<sup>1</sup> A. L.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52), p.4.

達到臺灣以外地區的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在這種意義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之下，臺灣地區居民強烈地自覺：(1).臺灣不再是「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2).臺灣也不再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提供廉價勞工的國家。

我們接著舉近年來發生的具體事實，闡釋以上所說的臺灣新文化的兩個動向。

第一，說明臺灣內部各「領域」或「群體」自我意識的覺醒這個新動向，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自從 1987 年 7 月戒嚴令廢除前後，各形各色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的社會運動。根據調查統計，自 1983 年到 1987 年臺灣總共發生了 1516 件自力救濟的群眾運動案例，而單單 1987 年就出現了 676 個事件。<sup>2</sup>

在 1987 年戒嚴令廢除以後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之中，最引人注目也最能顯示臺灣文化變遷的訊息的就是農民運動。1987 年以後臺灣的農民運動，有其必然性及其文化史的涵義。正如我過去的研究所指出的，<sup>3</sup>臺灣農民運動的必然性植根於兩項因素：第一，從歷史角度看，在日據時代（1895-1945）的「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殖民政策之下，臺灣農業與農民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剝削，日據時代臺灣農民運動之所以風起雲湧，與當時臺灣的資本主義化與耕地的集於少數地主手中有密切關係。1945 光復後，在 1950 年代農業部門是「軍需民糧」的提供者，1960 年代以則是「工業起飛」的踏腳石，1980 年代以後則

---

<sup>2</sup> 朱雲漢：〈從總體社會結構的變遷看自力救濟性街頭運動的湧現〉，「自力救濟與公權力行使研究論文發表會」宣讀論文，臺北：1988 年。

<sup>3</sup> 廖正宏、黃俊傑：《戰後臺灣農民價值取向的轉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頁 152-154。

又常成爲外交部門的「救火隊」，農業部門的「自主性」相當薄弱。戰後 40 年來，由於臺灣農業「主體性」與「自主性」的淪喪所累積的民怨，終於隨著戒嚴法的廢除，如同壓力鍋蓋掀開以後，長期在鍋內翻騰的怨氣，宣洩而出，一發不可收拾。第二，從政經結構來看，現階段臺灣農業問題與 1950 年代或 1960 年代的農業問題，有本質上的不同，這是由於整體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所導致的。當前農業與農民，受到非農業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強有力的干擾，例如農業主管單位常爲配合外交部門的需要，而以高過國際正常價碼的價格，向若干國家「緊急採購」國內並不急需的農漁產品，直接打擊國內農業的發展。至於爲因應對美貿易逆差及外交上的考慮，而大量進口美國蘋果、柑橘等農產品，更是顯著的例子。這是政治及外交對農業的干擾，是當前臺灣農民運動興起第 2 個根源。

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戰後臺灣農民的思想世界，直到 1987 年以前一直未能建立「自作主宰」的主體意識。造成這種思想狀態的原因當然不止一端，它與戰後臺灣戒嚴體制、工商經濟掛帥等政治社會經濟背景都有關係。在戰後臺灣農業政策的主導下，農業部門所扮演的是「工具性」的角色，而不是「目的性」的角色。我們在本節中所說的「農民主體性」與「農業自主性」的失落，正是這種「工具性」取向的農業政策所必然導致的結果。在這種狀況之下，農民的主體意識一直蟄伏不彰。直到最近 10 多年來，農業危機日趨嚴重，農業從過去在經濟體系中的「支持部門」（supporting sector）逐漸轉變爲「自求生存的部門」（sustaining sector）之後，農民群體才有了「自我意識的覺醒」，這正是臺灣文化的新動向的一種表現。

但是，我們再深入觀察這種作爲臺灣新文化動向的農民運

動，就會發現：農民作為一個群體與政治人物作為另一個群體，兩者間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常常是後者牽引前者。我在 1988 年農運初起時訪問苗栗縣某一位農運領袖時，他說：<sup>4</sup>

本來農民他們自己強調不讓政治介入，而國民黨也故意的醜化說不要讓政治介入，其實這是不可分的，因為領隊的人如果不是政治人物的話，農民永遠無法走上街頭，這點我們非常清楚。在此情況下，農民問題與政治問題本質上就不可分〔…〕。

從這一段農運當事人的證言，我們可以看到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的密不可分，以及前者對後者的滲透力。

第二，再從臺灣的世界觀來看，說明臺灣自覺不同於中國大陸及世界這個新思潮的，就是(1).近年來臺灣民間與官方展望臺灣與中國大陸未來關係時，所提出的各種言論。(2)臺灣自覺地要成為 21 世紀的新世界秩序中的一個中心，如「亞太營運中心」等。

(1)臺灣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具體地表現在臺灣朝野人士對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新思考之上。先說官方觀點，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在 1994 年 7 月發表《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反駁中共國務院 1993 年 8 月 31 日所發佈《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指出：<sup>5</sup>

---

<sup>4</sup> 1988 年 4 月 24 日晚上我與該農運領袖訪談記錄。

<sup>5</sup>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就臺灣地區未來的政經發展而言，最近幾年來，中華民國在臺灣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寧靜革命」的過程。在經濟上、政治上，均成功地實現了中國歷中上第一個富裕、尊重人權與法治的民主社會。蓄積已久的經濟實力與社會文化活力，透過民主自由的過程釋放出來以後，一面迎向世界，走出「務實外交」的道路；一面迎向中國大陸，成為擴大兩岸民間各項交流的重要觸媒。〔…〕

海峽兩岸的分裂分治，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我們呼籲中共加速推動經濟改革、從事全盤政治改革。唯有如此，才能使大陸同胞早日脫離貧窮匱乏，過著具有人性尊嚴的生活。我們也呼籲中共，要坦然體認到兩岸暫時分裂分治的事實，以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才能為兩岸和平統一創造契機。

在以上的論述中，臺灣官方是以臺灣為主體論述臺灣與中國大陸未來的關係的。這種新觀點也與民間社會的看法互相呼應，1993年12月10日臺灣教授協會等23團體，在大陸海協會代表來臺北參加會議前夕，發表對兩岸關係的意見書。這件意見書結論說：<sup>6</sup>

總之，臺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臺灣前途，選擇自己的生活

---

1994)，頁10-11。

<sup>6</sup> 行政院陸委會：〈兩國兩制，和平共存——臺灣人民對臺灣與中國關係的基本主張〉，刊於《自立晚報》，1993年12月10日-12日，引文見12月12日，3版。

方式。任何政權如果要長遠地得到臺灣人民支持，就必須認同臺灣，與斯土斯民結成「臺灣命運共同體」。

這種以臺灣自己作為目的的新看法，具體地顯示出近年來隨著臺灣快速的民主化，一種植根於「自我意識的覺醒」的臺灣新文化正在建構之中。在這種新文化的世界觀中，臺灣已經從過去的「在己」（thing-in-itself）自我轉化成為「為己」（thing-for-itself）的狀態。

（2）近年來臺灣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不僅表現在對海峽兩岸關係的新看法上，也呈現臺灣在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新局勢中的自我定位之上。近年來臺灣工商企業界與政府，共同推動種種措施，希望早日促使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1994年11月9日，財政部更宣示加速推動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以便能在6年之內使臺灣成為「亞太金融中心」。<sup>7</sup>凡此種種企劃，均顯示一種以「自我意識的覺醒」作為精神基礎的新世界觀正在臺灣形成之中。這種新的精神自覺是有其現實基礎的，舉例言之，交通部統計1994年1月至9月，以平均每日營運量來看，中正機場每日起降班機次數為226架次，旅客人數32,213人次，貨運噸數是2,026.5公噸。<sup>8</sup>這樣頻繁的對外交通網絡，正是形成臺灣新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 （二）歷史意義

現在，我們可以思考這個問題：以上所說的這種以「自我

---

<sup>7</sup> 《中央日報》，1994年11月10日，2版。

<sup>8</sup> 《自立晚報》，1994年11月13日，5版。



意識的覺醒」為特質的臺灣新文化，有何歷史意義？

如果與傳統中國文化比較，我們可以發現，臺灣新文化與在大陸的傳統文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傳統中國文化所呈現的是政治主體支配政治以外的社會、經濟、思想等主體，而形成「一元論」<sup>9</sup>色彩頗為強烈的文化傳統。但是，在臺灣新文化中則除了政治主體之外，社會主體、經濟主體、思想主體均展現活潑的生命力，也具有某種自主性，而且處於激烈競爭之狀態。整體而言，臺灣新文化展現強烈的「多元論」(pluralism)的特質。

從這個觀點來看，臺灣新文化的形成及其發展的歷史意義正是在於：它代表悠久的華人文化從傳統的「一元論」向「多元論」的轉化。在這種深具歷史意義的大轉化過程之中，作為傳統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從屬原則」(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sup>10</sup>—指文化中的諸多主體（如社會、經濟等主體）均服從於單一主體（如政治主體）的支配—逐漸轉化為「並立原則」(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指文化中的諸多主體處於並立及競爭之狀態。

我們進一步闡明這種從「一元論」向「多元論」轉化的涵義。遠自西周時代（1027？-722 B.C.），「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對西周帝國王權的描寫。自公元前

---

<sup>9</sup> Donald Tregold, *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 Religious and Secular Thought in Modern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Vol. 1, P.xxii

<sup>10</sup> 牟宗三先生語。參看牟宗三：《中國文化的省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68。

221年，秦始皇（嬴政，在位於 259B.C-210B.C.）統一中國之後，這種政治力支配一切的狀況，已完全確立。因此，在學術領域內的經典詮釋，就深深受到政治力的滲透而遭受扭曲。舉例言之，《論語》中孔子所說：「雍也可使南面」中的「南面」一語，明白地是指「人君之位」，但是秦漢以後的儒者，面對大一統王權的壓力，只能解釋為「諸侯之位」。這種對經典原意的扭曲，最能顯示對傳統中國史上政治力對文化領域的巨大影響。在社會經濟領域裏，王公貴族的田莊、官僚資本的壟斷等現象，都反映了政治力的絕對支配性。相對於政治力而言諸如社會、經濟、學術等非政治領域，則普遍缺乏自主性，而對政治力具有強烈的依賴性格。

在這種「單一主體性的支配」之下，傳統中國文化史上所見的各個活動部門之間的關係，是依牟宗三先生所謂的「從屬原則」而決定的。經濟、社會及文化部門的活動，均從屬於政治主體。它們本身的運作欠缺「內在邏輯」。換句話說，社會、經濟乃至文化活動本身都不能決定它們的活動，它們的活動多半是為了政治的目的而存在。因此，它們本身就成為「手段」，而不是「目的」。

以上所說的「單一主體性的支配」以及「從屬原則的發達」，這兩條中國文化史的基調，在最近 40 年的臺灣地區，面臨了歷史性的轉變。其基本的變遷方向有二：一是從「單一主體性的支配」走向「多元主體性的並立」；二是「從屬原則」轉化為「並立原則」。

臺灣在戰後卅年之間，完成了經濟結構的脫胎換骨。戰後臺灣發展經驗中，最深切著明的變遷就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

會的轉變。1952年農業人口佔臺灣全省人口的52.4%，此後每年下降，到了1987年，降為20.5%。農業產佔國內生產淨值（NDP）的比率，從1951年的30.9%，至1964年降為28.22%，1972年降至14.12%，至1982年更降為8.7%。光復後的臺灣地區以不到40年的時間，完成了日本明治維新以降，將近百年才完成的歷史過程。這種經濟結構的急速改變，不僅改變了戰後臺灣的社會結構，創造了日益茁壯的都市中產階級，也帶動了文化生活的改變。農業社會的消逝，使土地不再是價值的唯一依據。我在1985年年底與已故廖正宏教授所進行的農村調查資料顯示，74%的受訪農民認為出賣土地並不可恥，而57.6%農民更認為土地不能作為個人社會地位的指標，教育程度、收入等逐漸成為衡量人的社會地位的指標。<sup>11</sup>在農民心態日漸改變的同時，教育的普及、大都市的興起以及國際貿易的發達，都進一步促使價值系統日趨多元化。這種歷史的發展趨勢，隨著1987年戒嚴法的廢除而達到一個新的高潮。

在當前的臺灣環境裏，政治力雖然在多數場合仍發揮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但是，經濟力的躍動及其所培育的社會力的蓬勃也日漸顯著，都共同促成了一個以「多元主體性」為基礎的新社會文化型態的出現。

「多元主體性」的形成，告訴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在戰後臺灣已完成了嶄新的轉化。與此互相呼應的新文化現象，則是「並

---

<sup>11</sup> 黃俊傑、廖正宏：《前引書》，頁45-54；Cheng-hung Liao and Chun-chieh Huang, "Attitudinal Changes of Farmers in Taiwan", in Joel D. Aberbach et. al. eds.,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M. E. Sharp, 1994), pp.354-369.

立原則」之取代過去的「從屬原則」，而成爲文化中各領域關係之特質。相對於戒嚴令廢除以前的狀況而言，近年來國內政治力對於非政治領域（如經濟、社會或學術、文化等部門）的影響力雖然仍然不可忽視，但已漸漸式微。各部門的自主性日益提昇，例如教育部門本身愈來愈要求以人格的培育作爲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如同過去以教育作爲經濟或國防建設的「手段」。

### 三、臺灣新文化形成的歷史背景

臺灣新文化的形成如何可能？這是我們接著必須探討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漢人大量移入以後 4 百年來的臺灣史歷經統治主體的變遷，從荷蘭人（1624-1661）、明鄭（1661-1683）、清代（1683-1895）日本（1895-1945）到國民政府（1945 至今），政權遞遭，物換星移，爲臺灣文化注入了多元的外來文化質素，奠定臺灣文化的多元性的基礎。但是，其中較具關鍵性的歷史因素有三：（1）1895 年以後日本統治臺灣所造成的臺灣與中國大陸歷史的斷裂；（2）1949 年臺灣光復後快速的經濟發展，及其所引發的社會政治轉型，（3）1987 年 7 月戒嚴令的廢除。以上第一個因素使臺灣從傳統型的文化，邁向現代型的文化；第 2 個因素則爲臺灣新文化中潛藏的多元性特質，奠定了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並在第 3 個因素出現後，完全爆發出來。我們先檢討第 1 個歷史背景。

### (一) 一八九五年以後歷史的斷裂

本書第 7 章曾說明：<sup>12</sup>最近一百年來，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歷史的斷裂」明確地表現在許多具體歷史事實之上。

20 世紀的中國，所經歷的是一個憂患的世紀。公元 1900 年，義和團以其激烈的排外主義包圍北京各國使館後，清廷向各國宣戰，接著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次（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凌達於高潮。1911 年爆發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繼踵而至的是一連串動亂歲月，1915 年袁世凱稱帝、日本提出 21 條要求，進一步暴露侵華野心；1917 年，張勳復辟，接著是軍閥混戰，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戰爭，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使生靈塗炭，直到 1928 年北伐完成，中國才在形式上歸於統一。但日本軍閥侵華野心日益高漲，步步進逼，終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引爆蘆溝橋事件，中國全面對日抗戰。從 1937 年至 1945 年，中國歷經八年抗戰，人民流離失所，苦難遍嘗。抗戰勝利之後，卻又繼之以國共內戰，終於大陸政權易手。1949 年大陸政權易手之後，中國人民在共黨統治之下，又歷經「反右」（1957-58）、「大躍進」（1958-60）、「文化大革命」（1966-76）等一系列的浩劫，至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案件而達到一個高潮。

相對於中國百年來的動亂與滄桑，最近一百年來的臺灣則與中國大陸走在不同的歷史道路上。自從 1895 年日本佔領臺灣以後，早期武裝抗日運動此起彼落，1920 年代以後也有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是從歷史角度來看，日據時代（1895-1945）是

---

<sup>12</sup> 本書第 7 章，頁 195-234。

臺灣從傳統社會轉化為近代社會的關鍵時期。(a) 日本殖民當局固然剝削臺灣的各種資源，但是也積極從事各種建設，舉例言之，1911年12月1日從基隆到打狗（高雄）鐵路夜間通車，1913年12月20日起縱貫鐵路全線通車，1930年4月10日建設長達10年（1921-1930）的嘉南大圳正式供水，1931年高雄第二火力發電廠所開始供電。這些下層結構的建設，在相當的程度內奠定了臺灣邁向現代化的基礎。總而言之，當中國大陸在最近一百年背負著沉重的傳統歷史包袱，掙扎於「傳統／現代」的困局之中時，臺灣早已成功地從「傳統」邁入「現代」。

(b) 而在20世紀前半葉，臺灣透過日本而吸納的大量的日本文化以及歐洲文化質素，更為臺灣文化注入了多元的文化泉源。關於以上第2點，我們可以作為臺灣文化一部分的臺灣美術為例進一步加以說明。日據時期臺灣的繪畫藝術，深受官展派裡的學院系統影響。臺灣美育始於1900年臺北國語學校開設師範科將「圖畫」納入課程，<sup>13</sup>臺灣本地的師範教育與日本內地的美術學校，則是臺灣近代美術的人才培育所。從當時活躍於臺灣畫壇的本土畫家之養成背景來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日據時代的臺灣透過日本而學習西洋及東洋文化的事實，例如當時就讀於東京美術學校的張秋海（1899-1988）、顏水龍（1903-1997）、陳植棋（1906-0931）、陳澄波（1895-1947）、廖繼春（1902-1976）、王白淵（1902-1965）、郭柏川（1900-1974）、李梅樹（1901-1983）、李石樵（1908-1995）、廖德政（1920-）、陳清汾（1910-1987）、陳承藩等；就讀於東京女子美術學校的陳進（1907-1998）；就讀於川端畫學校的林玉山（1908-）、林錦鴻（1905-1985）、藍運

---

<sup>13</sup> 謝里法：《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2年三版），頁252。

登（1912-）；就讀於關西美術院的楊三郎（1919-1989）就讀於東京文化學院的楊三郎（1910-1998）等，<sup>14</sup>都是通過日本而吸納日本及西洋繪畫內涵與技巧。

## （二）1949 年以後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

第二個歷史因素是 1949 年以後臺灣所經歷的快速的經濟變遷與教育擴張。這兩項變化，有助於將百年來臺灣文化生活中所潛藏的多元性加以彰顯出來。我們接著討論這項因素。

在光復初期的 1950 年代的臺灣，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1952 年農業人口佔總人口比率的 52.4%，而國內農產品生產淨值佔經濟總值的 38.3%。經由對外貿易，農產品外銷所獲得的利潤為 60 年代的工業「起飛」奠定良好的基礎。1953 年後，隨著 4 年經濟建設計畫的完成，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開始穩定的下降：1960 年是 48.98%，1965 年是 45.4%，1970 年是 40.9%，1975 年是 34.7%，1985 年是 18.1%。<sup>15</sup>從人口結構改變的角度來說，在 30 年內，臺灣已由農業臺灣蛻變為工業臺灣。在臺灣經濟結構從農向工快速轉化的同時，臺灣的教育也有快速擴張。過去 40 年來臺灣教育在數量的成長方面較有成就。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盲比例由 1952 年的 41.2%，減至 1989 年的 7.1%；此外，接受中等教育的比例亦由 1952 年的 8.8%提

---

<sup>14</sup> 參考謝里法：《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2 年三版）；王秀雄：〈日據時代臺灣官展的發展與風格探釋——兼論其背後的大眾傳播與藝術批評〉（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1992）；徐海玲：《臺灣美術圖繪》（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sup>15</sup>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O.C.,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0), Table 4-3, p.65.

昇至 1989 年的 44.9%。<sup>16</sup>自 1968-1969 學年度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來，教育的普及更是加速發展。經濟發展與教育擴張正是戰後臺灣文化變遷的催化劑。

戰後臺灣的文化變遷主要是在「傳統性／現代性」之間以及「本土化／國際化」的兩極之間擺盪。<sup>17</sup>從 1950 年代土地改革時期到 1980 年代經濟國際化時代的來臨，在這 30 多年期間，臺灣農民的價值取向歷經了極大的變遷。光復初期的「農本主義」心態與價值觀，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已逐漸消逝。對農民而言，「土地」的商品化的性格日益顯著。在工業化衝擊之下，知識階層的大學生價值觀中的「未來取向」與「個人取向」也愈來愈為明顯。以上的價值變遷可以反映臺灣文化遷變從「傳統性」向「現代性」的移動。除此之外，隨著工業化趨勢也帶來了「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文化現象。「世俗化」在民間宗教中表現得較為明顯。研究文獻告訴我們：1960 年代中期以前，西方宗教已長足的發展，但在此以後，則本土的民間信仰快速成長。從這項轉變也可以反映出「國際化」與「本土化」在文化領域中的拉鋸戰。

戰後臺灣的思想變遷，主要表現在「中國」與「西方」的激盪。官方文化政策提倡以官方所解釋的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文化，民間學者則致力於對儒學傳統提出新的解釋，但另一方面思潮如存在主義、自由主義則又有力地衝擊臺灣的知識界，形成戰後臺灣思想史多采多姿的面向。但是，在 1987 年 7

---

<sup>16</sup> TSDB, Table 5-4, p.89.

<sup>17</sup> 黃俊傑：〈戰後臺灣的社會文化變遷：現象與解釋〉，收入本書第 1 章。



月戒嚴令廢除以前，不論是傳統中國思想的再解釋，或是西方思潮的引介，都受到當時臺灣特殊的政治經濟情勢的影響，很具體地顯示出所謂「臺灣經濟」的「特殊性」。這種特殊表現在戰後臺灣小型工業的極具韌性；表現在民間信仰或祖先崇拜之深受利得取向之影響；也表現在官方對儒學的新解釋以及西方思潮進入臺灣後之受到扭曲與重組。以上這一切現象都共同告訴我們「臺灣經驗」的特殊性格。

由於戰後臺灣文化發展經驗具有上述的特殊性格，所以，臺灣文化中潛藏大量而異質的文化質素，構成臺灣文化中「多元主體性」並立之狀態，而與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單一主體性」（指政治主體性）支配其他主體性（指政治以外之主體性）之狀態，構成鮮明對比。臺灣文化中的「多元主體性」，基本上是在近百年來（特別是近 50 年來）臺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基礎上而發展的。

但是，在 1987 年 7 月戒嚴令廢除以前，在政治力凌駕一切的體制之下，臺灣文化中充滿生命力的「多元主體性」，一直處於被壓抑、鬱而不彰之狀態中。自從戒嚴令廢除之後，最近 7 年多以來，「政治主體」以外各種以前處於沉睡狀態中的「社會主體」、「經濟主體」等紛紛甦醒，甚至在「社會主體」中的各種不同族群、利益、階級都在甦醒之後，企圖具體落實於公共領域之中，而使近年來的臺灣處於「多元主體並立而互相衝突之狀態」。臺灣現階段的政治鬥爭與社會衝突，基本上都可以說是以上所說的文化轉型的某種外延表現。

#### 四、臺灣新文化中的新問題及其對應策略

##### (一)「自我中心主義」及其克服

在以上的討論裡，我們說明：21 世紀臺灣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之中。這種新文化是以「自我意識」的覺醒為其基本特質，充滿了多元性，它與傳統中國政治主體主宰一切領域，「一元論」色彩很強的文化體系，有其本質上的差異性。我們也從歷史觀點指出，近百年來臺灣與中國大陸歷史的斷裂，尤其是二次大戰以後臺灣的經濟發展，是臺灣新文化得以醞育發展的重要歷史背景。

現在，我們進一步思考兩個問題：(a).這種正在快速發展中的臺灣新文化潛藏著何種問題？(b).應如何因應才能使臺灣文化在下一個世紀邁向坦途？

(a).蘊涵在臺灣新文化中的第 1 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由於臺灣文化中的各個「領域」或「社群」的「自我意識」高度覺醒，並從過去的靜止狀態走向活動之狀態，所以諸多「領域」或「社群」間之相互競爭乃至衝突不僅不可避免，甚至日趨激烈。因此，如何引導臺灣新文化中這種「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 走向健康道路，而促使各「領域」或「社群」回歸和諧之狀態？

爲了闡釋臺灣新文化中確實存有不健康的「自我中心主義」，以至引起文化中之各「領域」或「社群」之激烈衝突。我們可以舉 1987 年以來所發生的爲例加以說明。

我們可以以本文第 2 節所討論的農民運動作爲對臺灣文化轉型的觀察點，因爲農民問題是華人文化的一項重要指標。傳

統中國文化就是農業文化。在中國歷史上，農民是最為安土重遷、樂天知命的群體，他們一向篤定地握著鋤頭，向大自然生活。但是，今日的臺灣農民，在外國進口農產品的打擊之下，毅然走向街頭，爭取經濟人權。

1987年以來的農民運動，生動而深刻地反映了「農民靈魂」業已消逝。現在臺灣的農民已不再是傳統中國史上所見的「植根於泥土的」農民，他們是高度市場導向的「農場經營主」，他們在經濟邁向自由化國際化的世界裡，奮起而捍衛他們的權益。所以，從臺灣農民運動的發展可以窺見臺灣文化變遷的訊息。

在戰後40多年來的臺灣，農業部門所扮演的基本上是「工具性」的角色，而不是「目的性」的角色。早期的農業是「軍需民糧」的提供者，1950年代初期，第一期經濟建設計劃開始以後，農業一直扮演「以農業促進工業」的角色。在這個階段初期，農業扮演著「進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e)的角色，即以農產品外銷，特別是米和糖（日據以來即如此），以其換得的有限外匯，向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購買如肥料等工業產品。後來，當臺灣初級工業逐漸起飛發展以後（如加工出口區的設置、紡織工業的發展等），農業部門又以其龐大的剩餘勞力扮演「出口替代」(export substitute)的角色，即由農業部門提供工業部門的人力以促進出口。而在1965年，第三期經濟建設計劃完成之後，農業部門在總體經濟裏面已經江河日下，顯示臺灣經濟結構已從農業為主過渡到以工商業為主。在這樣的發展過程裏，我們可以說40多年來的農業政策，表現出「主體性的錯置」，換言之，即農業政策的主體一直沒有擺在農民身上，而是被擺在農業以外的其他部門。由於主體性的錯置，農民為臺灣

經濟發展在歷史過程中貢獻最大力量，而在分享「經濟大餅」時並未得到應有的一份。這種狀況使農民群體的主體性一直處於鬱而不彰的狀態。

但是到了 1987 年戒嚴令廢除之後，臺灣的農民也像工人、學生、原住民一樣地，開始進入「主體意識的覺醒」的階段。他們在 1988 年以後的歷次農民運動中，呼喊著要求重建農業自主性與農民主體性。農民階層的覺醒很能顯示「後戒嚴時代」的臺灣文化中，各「領域」或「社群」的動向。臺灣已經進入「多元主體」並立的新文化格局了。但是，農民要求保護農業的訴求，卻與都市中產階段要求經濟國際化與自由化的呼聲互相牴牾。

那麼，如何使現階段臺灣文化中「多元主體」從互相衝突走向和諧呢？這是未來臺灣文化發展中最需要深思的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途徑包括兩項策略：(1)建立一個穩定而超然的法治秩序，以便促使多元主體由衝突走向調和之境界。中國文化幾千年來，最欠缺的就是一個超越諸多主體的「法治主體」。由於「法治主體」的不彰，所以中國文化常常將各種主體性衝突的問題簡化成為道德墮落的問題；也未能發展出保障個人的「消極自由」(Isaiah Berlin, 1909-1997) 所謂 (negative liberty) 的種種制度建構（如權力的制衡制度、言論自由的保障）等。<sup>18</sup> 未來臺灣文化的發展，必須積極建立「法治主體」，並在「法治主體」之下建構客觀而隱固的「法治秩序」，才能使近百年來臺

---

<sup>18</sup> 參見：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his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18-172.

灣文化史所孕育而在近年來日趨壯大的「多元主體性」，真正獲得保障，並且由現階段的激烈衝突走向和諧，而在廿一世紀開創臺灣文化的新局面。(2) 但是，在我們努力於克服臺灣新文化中的「自我中心主義」，尚有一項傳統文化資源可以加以運用轉化，這就是：古典儒家思想中對「個人」與「社群」關係的看法。近百年來的臺灣，由於快速的現代化以及深受近代西方文化的洗禮，所以常常將「個人」與「社體」視為互為對抗的兩極。近年來隨著「個人主體性」的高度覺醒，個人權益常被置於社群利益之上，而形成「自我中心主義」。但是，在先秦古典儒學中，「個人」是深深浸潤在「社群」之中的，「個人」與「社群」並非處於對立之狀態。個人生命的意義就在於社群生命的延續與繁衍，而且，「社群」生命的充盈也建立在「個人」的努力之上。這種傳統華人文化中的「個人—社會」觀，對於 21 世紀臺灣新文化的開展是一項重要的資源。

我們再以作為臺灣新文化的一種表現的農民運動為例闡釋以上這兩個論點。自從 1988 年以來，歷次的農民運動一再地顯示：在邁入 21 世紀前夕臺灣的新文化之中，不同「社群」之間有其互相依賴性與內在矛盾性。農運作為一種社會經濟運動，它必須動員一切力量尤其是政治力量，才能達到它所追求的目標。反之，就政治人物觀之，廣大農民自然是他們爭取的對象。因此，農運與政治力這兩「領域」實具有互相依存性，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但是，更深一層來分析，農運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它有它特定的社會階級基礎、訴求目標與運作的內在邏輯，形成農運的「自主性」，它雖與政治有關係，但不完全依賴政治力。而且，就政治人物之運用農民資源而言，兩者仍有矛盾性存在。

(1) 那麼，如何才能正確處理作為社會力的農運與政治力之間相互的依存性與矛盾性呢？我認為，今日農業諸般問題之出現，植源於農業部門受到非農業部門的滲透、鯨吞或蠶食。因此，就農業與非農業部門的互動而言，首須建立「農業的自主性」。再就農民運動中，農民與非農民之間的互動而言，「農民主體性」在農運中的地位必須加以確定，才能在複雜萬端的多元社會之中，使農運真正為農民謀福祉。在臺灣農民示威活動中，我們看到了政治力與農民團體之間，開始有了推移拉扯的互動關係。對這種「多元主體」競爭的新文化狀況，「法治秩序」的建立可以為「多元主體」的競爭建立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消弭衝突於無形之中。

(2) 從 1988 年以來的農民運動中，我們又可以發現：戰後臺灣的農民階層與都市中產階級、中小企業經營者，都有直接間接關係，因為後者常常出身於前者。也因此，農民運動對其他非農民階級也有一定的互動意義。農民運動的功能是多面的：農運首先是以農民為主體的，這些農民（專業農）不再是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74）筆下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的亞當和夏娃，他們可以經由農運而重返失去的樂園；就知識階層來講，他們可以得「民粹運動」（populist movement）式的精神洗禮；就住在都市的中產階級來講，他們長年累月居住在水泥叢林中，久違泥土的芳香，農運可以使其重享田園之樂。這就是農運的社會文化意義。也只有在這樣廣袤的視野裏，農運在臺灣文化史上的深刻意義才能被掌握，從這個角度來看，農民與整體社會是不可分割。這就是我們主張臺灣新文化應吸納傳統華人文化中的「個人與社會是有機體」的觀念的原因。

### (一)「部落主義」的陷阱及其超越

(b).臺灣新文化中潛藏的第2個問題是：由於臺灣新文化是以「自我意識」的覺醒為基礎，所以在臺灣的「自我」展開的過程中，如何避免由於過度膨脹「自我」而落入狹隘主義（parochialism）甚至部落主義（tribalism）的陷阱？

臺灣人自我肯定臺灣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而提出的「臺灣中心說」，早在日據時代就已形成。1941年8月10日，臺南名醫吳新榮在日記中就提出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觀，他說：<sup>19</sup>

一個人坐在書房中，無所事事望南壁的地圖。終於理清思緒，完成「臺灣中心說」思考：

- 一、臺灣為東南亞最中心地，故可稱地理上的聖地。
- 二、臺灣之東為世界最大洋即太平洋，西為世界最大大陸即亞細亞洲。
- 三、北回歸線橫斷中部，北為溫帶，南為熱帶。
- 四、越東海，北控日本列島；越南海，南控南洋群島。
- 五、日本列島之北，朝鮮半島為大陸之左手；南洋群島之西，中南半島為大陸之右手。
- 六、朝鮮之北，接臨滿洲、蒙古；越南之西，接臨泰國、緬甸。
- 七、滿洲之北，為世界未開之地西伯利亞；緬甸之西，為世界寶庫印度。

---

<sup>19</sup>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戰前）》（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頁112。

八、若說山東半島與海南島是中國大陸的兩耳，則臺灣正是鼻子。

九、於此聖地，南北有新舊兩都兩地；又東半為山地，西半為平野。

十、他日新高港完成，則為東亞最大港；臺中可成東亞最大都市。

這種以臺灣為中心的新世界觀，近年來頗有發展，而成爲臺灣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新一代知識份子展望中的廿一世紀的臺灣，是改變中國大陸的主力，也是世界的新中心。<sup>20</sup>

(b.) 如何將這種「臺灣中心說」引導到自立自信但不自蔽的方向？這是 21 世紀臺灣文化所面臨的一項挑戰。

因應這項文化挑戰，最可行的策略是：臺灣人要勇於吸納來自臺灣以外地區的新文化質素如源自大陸的中原文化與其他地區的文化（如歐美文化）。從歷史角度來看，勇於吸納外來文化本來就是臺灣文化史的特徵。歷史研究文獻告訴我們，臺灣作爲一個世界經濟與文化交流的中心，早自 16 世紀開始即已成爲近代史上西歐各國爭取之基地，與西方文化之接觸甚早。在荷據時期，臺灣已成爲荷蘭人將中國之商品輸往巴達維亞、日本、荷蘭及東印度各地商館之貿易中心。明鄭時代鄭氏父子之興起，主要的憑藉力量就是當時的外洋通商貿易。<sup>21</sup>到了第二次

---

<sup>20</sup> 蔣年豐：《臺灣人與新中國——給民進黨的一個行動哲學》（臺中：作者自印本，1988）。

<sup>21</sup> 參考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25-44；曹永和：〈荷蘭時期臺灣開發史略〉，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45-67，尤其是頁 66。



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臺灣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更是促使臺灣與世界進行最密切的往來。以上這些具體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臺灣文化之所以活潑而多元，乃是由於臺灣一直有一個勇於吸納外來文化的傳統，臺灣在 21 世紀仍應繼續維持這項悠久而開放的文化傳統，以免「自我中心論」流入排外主義的心態。

## 五、結論

在 21 世紀的臺灣在過去數百年來，尤其是最近半世紀以來的歷史積澱之上，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文化格局。臺灣新文化是以「自我意識」的覺醒作為特質，充滿了強烈的「動態精神」(dynamism)，文化中的各個「領域」或「社群」都努力於將它們的意志加以落實在現實世界中。這種充滿生命力的「動態精神」正是臺灣新文化的靈魂，也是「海洋中國文化」的共同資產。<sup>22</sup>

臺灣新文化中的「動態精神」，是 4 百年來先民從閩粵各地移民來臺開拓寶島，明鄭時代反抗清朝政權，日據時代臺灣人反抗日本殖民當局，以及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精神基礎。在即將到來的 21 世紀裡，臺灣新文化中的精神資產，到底是因為文

---

<sup>22</sup> 溝口雄三曾區分兩種中國文化：一是以福建、廣東、香港、臺灣、東南亞及歐美華人社會為主的「海路的中國圈」；一是以中原為主體，包括蒙古、中亞以及絲路所及之地的「陸路的中國圈」。見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頁 306。順著這種看法，我們可以說臺灣文化正是在「海路的中國圈」文化中，因具有強烈的開拓意志與動態精神，而特別珍貴。

## 252 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

化中的各「領域」或「社群」因「自我中心主義」而流為互相抵消？或是由於法秩秩序的建立，並吸納中原儒家文化中「個體」與「群體」和諧的理念，因而邁向另一個文化新局面？這是我們現階段正面臨的重大抉擇。（1994年11月15日初稿）